

造福人类是诺贝尔遗嘱的灵魂

To Benefit Human Beings Is the Soul of the Nobel's Will

陈敏豪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研究员 上海 200085)

我要求遗嘱执行人……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奖给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诺贝尔遗嘱

20 世纪只剩下六年了,旧世纪在风云叱咤,雪雨交加之中正匆匆离去,新世纪在世人的憧憬期盼之中正姗姗而来,人类文明的演进也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一条质的分界线上。那就是文明社会必须放弃病态地追求物质技术进步的纯实利主义发展,转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

阿尔弗雷得·伯纳德·诺贝尔与世长辞 98 个年头了,他那崇高而又不乏自省精神的遗嘱被忠实执行了也将近一个世纪。从 1901 年这个遗嘱被执行的第一年起,诺贝尔奖金及其颁发就逐渐成为照耀和记录人类文化科学成就的明灯之一,在世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作为一项将长期存在下去的事业,诺贝尔奖金的颁发在未来是否能继续保持已有的声望,将取决于它在人类文明演进面临的转折大潮中能否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与转变,在今后文明演进的新道路上能否以更强的亮度照耀和记录人类文化科学的新成就,更确切地说,将取决于它对解决人类文明当前和未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发挥什么作用。

时代是发展的,世界是变化的,人类文明演进的各个阶段所面临的主要课题也是不同的,以造福人类为宗旨而颁发的诺贝尔奖也应当而且必须同这些课题紧紧扣在一起,促进它们的解决。

一、

培根、笛卡尔和牛顿三位伟大科学先驱的非凡成就划时代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近、现代产业的诞生和发展起了催生的作用,促进了人类文明达到今天这样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的伟大贡献在科学史和人类文明史上是永不泯灭的辉煌里程碑。

然而,巨大的光明也使被照耀的物体向大地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几百年来,培根经验主义的自然观、笛卡尔崇尚分解的科学方法和牛顿力学的机械论世界图景也导致了还原主义在科学领域的盛行,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了划分专业、学科的传统。这种专业化、学科化、纵深化的状况到本世纪已成为一种稳定的文化格局,在引导学术界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幸的后果,那就是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科都在各自狭窄知识领域的周围筑起一道难以横向沟通的屏障,使它们之间的交流、对话与融合步履维艰,而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的分野尤其难以逾越。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整个社会机构、部门的严格分家,从而使本来作为社会整体所应当具备的整体功能大大削弱,部门、行业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相互孤立,相互抵消,形成严重的内耗。然而,还原主义的盛行给这个世界投下阴影的最浓重部分还不在于此,而在于使人类丧失了自知文明,竟然把自己也从自然界中“分离”出去,俨然以“自然之主”的姿态傲立于尘寰之上,对自己身在其中的自然界为所欲为,不择手段,这就使人类在物质、技术方面频频取得成就的同时,也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困境。

因机械论世界图景而盛行的还原主义是一种分裂现实的思维模式,它导致人们将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世界还原、拆卸、分解为各自孤立存在的基本单位,也导致在物质技术方面颇有成就的人类在观念上将自己从所属的自然界中“拆卸”出来,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不断企图对自然界实行“征服”、“统治”和“改造”,使文明演进和科学发展走向畸形,使人类陷于空前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这是一个令人忧伤的巨大谬误!当代人类面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中有哪一个不是与这种以分裂现实为特征的还原主义内在相连的呢?

诚然,培根、笛卡尔和牛顿的学说今后在许多方面仍将继续为推进人类的文明和科学的发展发挥作用,然而他们所倡导的以分裂现实为特征的还

原论在科学领域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走到了尽头。以重建整体为特征的生态观已经崛起,它如实地恢复了世界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本来面貌,从生态系统能量、物质、信息的流动、循环、传递的客观运行机制出发,使人们在观念上把长期被还原论割裂开来的万事万物又如实地整合起来,逻辑上必然把无时无刻不参与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的人类从观念上引回自然界,如实地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存在,并逐步走上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道路。

生态学不是学者们漫步于山野林间时忽发奇想、心血来潮的产物,它是在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陷于深重危机的严峻时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阵阵痉挛和频频剧痛中崛起的。它的崛起意味着人类和环境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具有浓重的悲怆性。这个从总体上研究以人为主体的,以生态系统为重心的,以参与解决全球问题和解除人类困境为己任,探索人与环境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的前沿学科群,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沟通现在与未来的双向性。它既有立足现在,探索、洞察和规划未来的性质,也有立足未来,评估、审视和检验人类现在决策与行为的性质。这种双向性特别有助于矫治鼠目寸光、急功近利的顽症。

本世纪 70 年代,生态学运动触发了席卷各工业发达国家,也波及全世界的绿色风云。经过 20 多年的启蒙、论争和风风雨雨,这场绿色风云非但没有风流云散消沉下去,反而导致生态学大步走向社会化。它的思想、观念和见解不仅被众多的学科所吸收、借鉴,向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辐射开去,而且被世界广大公众普遍接受,以至于那些当初曾激烈反对这一学科和这场运动的人士后来也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态度和立场。生态学促使人们懂得了一个道理:只有从总体上协调好人类与其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人类社会才会有光明的前景。

生态学是崛起不久、相对年轻的发展中学科,虽然它已经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却仍有大量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理论探索的课题有待深入展开。这些课题的研究密切关系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福当代,更造福子孙后代,体现着全人类现在与长远未来的根本利益。

为了今后更好地实现诺贝尔在一个世纪以前留下的遗愿,我郑重建议,从他逝世 100 周年开始,增设诺贝尔生态学奖,从而使他在遗嘱中表达的要为人类作出贡献的真诚愿望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得到更充分的实现。

二、

生态学的崛起,绿色风云在全世界的广泛影

响,以及首先出现于欧洲的绿色市场,特别是 1992 年 6 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精神,对以往倍受尊崇的传统经济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不论是经济学中的古典派、新古典派,或是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或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甚至还包括曾经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其它经济学派,尽管它们相互间有许多不同之处,存在着种种分歧,甚至还有激烈的争论,然而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普遍缺乏生态观念。

这些经济学的学派都没有如实地将经济视为整个生态和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而是倾向于孤立地观察、研究经济过程。传统经济学家通常习惯于仅仅用投入、产出、效益、生产率、国民生产总值……去阐明他们的理论和基本概念,或在表达上刻意追求数学式的简洁和美感,试图向经典学科靠拢,却很少,甚至不去考虑经济活动所不能脱离的生态背景,不顾及经济活动所付出的环境成本和生态代价,以及各种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因此,他们所使用的某些经济学概念和理论,就不足以概括一个有限的、在根本上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所包含的深刻、全面的景象。

经济行为一刻也脱离不了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中各种组成成分之间主要是非线性的相干协同关系,很少存在线性的因果决定关系。那么,在以非线性为基本待征的生态背景下,经济行为怎么可能孤立、持续地保持传统经济学所顽强追求的线性增长态势呢?倘若强行保持线性经济增长,又怎么可能不以破坏生态环境、酿成社会危机为代价呢?

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以往经济学追求的那种单纯经济增长在为社会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为人类社会酿成了深重的灾难和危机。因而对指导这种经济增长的经济学设立专项奖金就远不足以体现,甚至有悖于诺贝尔要奖励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者的基本宗旨。在当代和长远的未来,世界最迫切需要的是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学说、决策与实践,这是全人类世代根本利益的所在。执行诺贝尔遗嘱只有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也有所作为,才是真正把握住了遗嘱的灵魂。

为此,我郑重建议,从诺贝尔逝世 100 周年开始,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改为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奖,奖给有突出贡献的环境学家、经济学家、生态技术创造者、环保技术开发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以及有关的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

三、

在 20 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承受着难以数计、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的苦痛,遭

受了数十年冷战和军备竞赛所强加的精神折磨、心灵摧残和经济重压。20 世纪是人类历史迄今磨难最深、血腥气最浓、冤魂最多、教训最惨重的一个最歇斯底里的世纪。并非巧合的是紧紧伴随 20 世纪人类苦难历程的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过程。事实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除了同物质财富增长的幅度呈正相关之外,同科学技术的军事应用、战争与军备竞赛对世人的伤害与杀戮、世界贫富的两极分化、各种社会危机的严重发展,以及地球生态环境遭到的破坏和污染等也都是呈正相关的。任何一个诚实的、正派的、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重要的事实。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已经议论了数十年,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但是,总有一种舆论不断地、顽强地辩护说:“科学技术是中立的、无倾向的,科学家是纯洁无辜的,科学技术成果应用的恶劣社会后果应由科技界以外的那些决策人物负责,科学家是无可指责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调子高扬的辩护声中,却不断有科学家为自己研究成果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而自责、痛苦、精神崩溃、自杀,甚至成为所在国家的叛逆者,其中也不乏诺贝尔奖得主。这是发人深省的。

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这两个领域的基础研究都力图通过适当的实验安排,尽可能明晰、精确地研究特定的现象,并用相应的数学语言加以表述。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它们所用的表述都具有条件命题的特点,说的是假如遇到一定的原因(前提),物理世界就会出现一定的结果(结论)。基于对这种规律性关系的认识,就可以通过人为的控制和干预造成一定的原因,从而导致所期望的结果。

这种自然关系可以为任何目的服务。为了获得科学和工程知识而设计的检验的和实验的方法是为了精确表达所研究的过程。然而,这些过程对人利用它们去达到什么目的是没有选择性的。它们没有方向感,只服从自身的规律,不排斥人赋予它们的任何可能的应用方式和应用目的。20 世纪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正是得自于人们对这类规律性的高度理解和悟性。这些成就既能为造福于人类的建设性目的而诞生,也能为破坏性、毁灭性的目的而产生,只要在其自身规律许可的范围内,就可以在性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事情上都派用场,似乎具有“中立性”。但是,当科学和技术一旦同某种社会目的相联系而发展时,“中立性”就不复存在了。那么,从事科学研究而又具有社会属性的科学家当然也就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论科学家的个人意识和主观动机如何,他们的科学实践总是有倾向性的,总

是和科学应用的取向有关的,因为用于科学研究的投资等待着成果应用效益的补偿。科学技术的决策一经形成,它就要按其自身内在的势头向前运行,并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产生影响。

科学家对研究项目的趋避,鲜明地表现出他们的价值观、处世态度和社会责任感,因为透澈了解研究成果各种潜在可能性的人首先就是科学家自己,然后才是其他人。科学家不是任人操持在手的用具,而是有理性、有思想、有灵魂、有人性、有判断力、有价值观的文明人。对科学研究成果所产生的不良社会后果,科学家当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拒不承担这种社会责任,即使不算犯罪,至少也是玩世不恭。

20 世纪的戏剧性历史向世人昭示,人类的科学事业必须极大地增加人的内容,要用人文的精神去弥合理智和感情的割裂,使科学永远为造福人类,为优化人类的生存状态而发展,资助科学和奖励科学家只能以造福人类这个根本的、永恒的宗旨为准则。

为此,我郑重建议,从**诺贝尔逝世 100 周年开始,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也列为诺贝尔科学奖的评奖条件。**

阿尔弗雷得·伯纳德·诺贝尔是生活于上个世纪的一位杰出先驱,而他的心灵却是向着未来的。他辞世前立下的遗嘱是他一生心灵和思想不断变化发展的最终产物,充溢着深沉的沧桑感和对世界的忧患意识,体现了他在精神上一个大跨度的升华。然而,那毕竟只是这位先驱在 19 世纪之末所能达到的升华,他毕竟不是全知全能的先知。他的遗嘱中关于要造福人类这个根本宗旨具有永恒的意义,而其中某些具体规定难免受到时代的局限。倘若诺贝尔也经历过 20 世纪的血雨腥风,也遭受到 20 世纪人类所遭受的创伤,也体验过隔世纪的同代人的痛楚,那么,他一定会对自己的遗嘱作某些修改和补充。忠实地执行诺贝尔的遗嘱,与其把遗嘱永远凝固在 19 世纪末的认识框架里,并恪守他 100 年前写下的条文和语句,倒不如紧紧把握住造福人类这个基本点,积极参与解决人类在当前和今后面临的重大问题。这才是对诺贝尔遗嘱的真正的忠诚。

人类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诺贝尔奖,而诺贝尔奖更需要通过不断为造福人类作贡献去体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新的世纪即将来临,诺贝尔遗留下来的事业也应跨入新的境界,以伴随人类迈向新的世纪。

(责任编辑 蔡德诚)